

红专之间

——大学政治理论课的植入(1949-1964)

陈钊

摘要：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标准，政治理论课是实现“红”的标准的主要手段之一。以彼时大学课程体系视之，政治理论课无疑是新生事物。因此，各大学虽相继开设政治理论课，但大学整体上“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的“专”的氛围仍对课程的教学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不得不逐步提升课程的专业化水平，以尽量避免大学原有课程体系的排斥。政治理论课教师虽然担负着改造大学生思想的重荷，只要条件允许，一般也愿意“教授高深学术”，而非仅充当“党的宣传员”。因此，政治理论课牵涉的“红”与“专”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之间“红”与“专”的分野，二是政治理论课本身的“红”与“专”。

1949-1964年，在外部专业课体系的无形压力下，政治理论课多次在“红”与“专”之间摇摆。被列为必修课之初，教育部从课程内容、课时分配、各门课的开课次序等各方面，力推政治理论课的专业化。到1956年，最终按专业课标准建立起一套政治理论课的运行机制。仅过了一年，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政治理论课的运行便由强调“专”转向强调“红”，原有的4门课全部停开，代之以“社会主义教育”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也从原来的注重知识学习转而向整风反“右”运动看齐。这样的状况持续一年有余，1959年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强调政治理论课“专”的一面，课堂教学注重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系统知识的学习，

考试侧重测验学生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1964年,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铺开,政治理论课的专业性再受质疑,10月底,中宣部将其定位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十五年间,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动不居,导致政治理论课的定位摇摆不定。红与专之间的平衡,是政治理论课植入大学后长期面临的挑战。

序 言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培养标准¹,政治理论课(现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红”的标准的主要手段之一²。以彼时大学课程体系视之,政治理论课无疑是新生事物。因此,各大学虽相继开设政治理论课,但大学整体上“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³的“专”的氛围仍对课程的教学产生重要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和大学不得不逐步提升课程的专业化水平,以尽量避免大学原有课程体系的排斥。政治理论课教师虽然担负着改造大学生思想的重荷,只要条件允许,一般也愿意“教授高深学术”,而非仅充当“党的宣传员”⁴。因此,政治理论课牵涉的“红”与“专”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之间“红”与“专”的分野,二是政治理论课本身的“红”与“专”。现有对政治理论课的研究,比较多地关注课程的设置、演变,也注意从中共根

-
- 1 1957年毛泽东提出这一标准。见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2页。
 - 2 “政治理论课”又称“马列主义课”、“政治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有关该课程的正式文件中多用“政治理论课”,故本文采用此名。因大学比专科学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门数多,教师相对较多,相关资料也更为丰富,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出课程植入后的状况,故本文的论述对象主要是大学的政治理论课。
 - 3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75页。
 - 4 《怎样教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北京市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教师发表意见》,《人民日报》(第4版),1957年9月23日。

根据地传统与苏联影响两个方面追溯其缘起,但鲜有从大学内部生态的角度考察政治理论课在这两层“红”、“专”间的生存状态⁵。本文以江苏省档案馆藏件为主,梳理教育部在政治理论课的设置、调整以及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在“红”、“专”之间的摇摆,探讨政治理论课设置、变迁的过程中,大学内部生态圈的反映。

一,“走上正轨”

1949年1月,燕京大学刚解放一个月⁶,就请沈志远开设“政治经济学”、翦伯赞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⁷。翦、沈二人在三四十年代即以传播马克思主义闻名,沈志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点名开除的“反动教授”⁸。此时北平的大学中,认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理论课“不值得一学”的还大有人在⁹,主事者请翦、沈开课,显然是想借

-
- 5 相关研究参见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大冢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黄福涛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石云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史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树荫、王炎《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49-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秦宣《新中国成立60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沿革及其启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0期;顾海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演化及其基本特点》,《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2期。新近的研究开始注意档案的运用,如陈红《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上海地区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与高校中国革命史课程创设与停开(1950-1957)》,《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6期。
- 6 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整个海淀镇,17日燕京大学复课。见杨奎松《一位美国传教士在燕京大学的“解放”岁月——围绕范天祥教授的日记和书信而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32页。
- 7 张玮璞、王百强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1919-1952)》,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363页。《人民日报》记载的开课日期是1949年3月,教师还包括蒙元史权威翁独健。参见《平学校增设政治课学生学习兴趣极高》,《人民日报》(第2版),1949年3月31日。
- 8 《平校教授解聘势在必行徐诵明答学生》,《申报》(第10版),1937年6月24日;《国立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务报告》,1938年10月5日,“教育部”档案,(新北)“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藏,A309000000E/0027/140.48-22/0001,第191页。

助二人的声名提升政治理论课的地位,证明政治理论课值得一学。在主事者看来,政治理论课首先是一门“课”,知识的传授是首位的。这与之后对该类课程的定位颇有差距。

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仅一周,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规定:

(一)本年度一、二、三、四各年级均必修:

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三小时,共三学分。

二、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三小时,共三学分。

(二)本年度文、法、教育(或师范)学院毕业班学生必修政治经济学,每周三小时,一年学完,共六学分,二三年级学生除特殊情况外,暂不修习¹⁰。

根据这一办法,政治理论课虽然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全面进入大学课程体系,所占学分最低为6,最高达12,但课程的开设既不按年级高低排列次序,课程的确切名称也没有完全确定,因为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明确指出,政治理论课的直接目的是“改造思想”,理论的学习无非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工具¹¹。但是,面对长期受“白专”观念影响的大学内

9 《京津各大学开哲学教学座谈会 检讨政治课教学问题》,《人民日报》(第3版),1949年12月30日。艾思奇在会议上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开设“打破了对社会发展史不值得一学的想头”。

1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11 《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要点》,1949年12月30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第7页。

部生态¹²，如何在意识形态灌输课程中讲出学术水平，仍是政治理论课教师面对的首要问题。在实际教学中，侧重课程的知识性、系统性仍是普遍的现象，即便是主张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目标是“改造思想”的教育部，也反对用“思想总结、思想检查、整风、坦白反省及斗争大会”的方式教学，而是要求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成绩评定也要求以理论学习为主要标准¹³。

两年后，教育部对政治理论课的定位也发生变化。1951年7月24日，教育部指示各地，政治理论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着重于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讲授”，教师要“尽可能由专人担任，加强专业化思想”¹⁴。9月，教育部又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了政治理论课的专业化。其一，要求高校不得再用“政治课”统称各门政治理论课，而应使用各门课程本来的名称。其二，已有的“政治教学委员会(或大课委员会)”改为各该课目的教学研究指导组，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教学研究指导组”、“新民主主义论教学研究指导组”和“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指导组”，作为这三门课程的基本教学组织¹⁵。从此，各门课程组成相对独立的学科科研单位。

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首次规定政治理论课的开课次序，要求：

-
- 12 《高等学校的政治课如何改进》，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8年第168期(总第503期)，1958年12月25日，第2-3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50；《关于青年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和问题》，1959年1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356，第3页。
 - 13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暑期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情况及下学期政治课应注意事项的通报》，1950年10月4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年-1952年)》，1958年，第76-79页。
 - 14 《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课讨论会的指示》，1951年7月24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第82页。
 - 15 《教育部关于华北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教学工作的指示》，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9页。

综合性大学及财经艺术等学院应依照第一、二、三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工、农、医等专门学院依照第一、二年级次序分别开设“新民主主义论”及“政治经济学”¹⁶。

1953年2月，高等教育部¹⁷在政治理论课序列中增加一门必修课“马列主义基础”¹⁸，要求从1953年度起，在各类高等学校的二年级开设，政治经济学改到三年级开设¹⁹。6月，高教部决定后半年起，高等学校一年级开设的“新民主主义论”统一改为“中国革命史”，其理由是：

全国解放以来，高等学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课程，结合三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对学生的政治认识有显著的提高。鉴于目前高级中学三年级已开设“共同纲领”课程，“新民主主义论”的政策部分与之重复，且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部分的充分讲授；同时“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部分，又与“政治经济学”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部分重复²⁰。

-
- 16 《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1952年10月7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13-14页。
- 17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教育部中分设高等教育部，1958年2月并入教育部，1964年7月重设，1966年7月再次并入教育部。参见何虎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or1996年，第148、159页。
- 18 该课开设之初暂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教材。见《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政治理论课基本情况的报告》，1954年3月，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164页。
- 19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的通知》，1953年2月7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2007年，第15页。

至此,大学政治理论课形成一、二、三年级依次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课程体系。这样的课程设置,既符合从具体到一般的认知规律,又避免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交叉重复,因此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认为,到1953年底1954年初,“大多数学校政治理论课已逐步走上正轨²¹。”此处的“轨”,实际就是专业课的一套运行规则。

政治理论课完全走上“正轨”是在1956年。这一年的9月9日,高教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以下简称《试行方案》):

一、各系科开设的门数和学时

马列主义基础——历史系的马列主义基础专业系业务课,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其他系科,一律都开。学时分102与68两种。

中国革命史——历史系的业务课,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其他系科,一律都开。学时分136与102两种。

政治经济学——财经院校及综合大学各财经系科系业务课,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医科院校(但药学院亦得学政治经济学而不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农林院校的兽医系、四年制综合大学的中国语文系、外国语言与理科各系及四年制艺术院校不开;其余各系科及五年制综合大学和五年制艺术院校都开。学时分136与68两种。

20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改“新民主主义论”为“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史”的教学目的和重点的通知》,1953年6月17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16-17页。

21 《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政治理论课基本情况的报告》,1954年3月,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61页。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系系业务课,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四年制财经系科不开;农林各系(农林经济与兽医除外)与工科各系(建筑学专业与海运类专业除外)四年制不开,五年制设选修;其余各系科一律都开。学时分 102 与 68 两种。

二、顺序

一年级开马列主义基础课。102 学时的学一年,68 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二年级开中国革命史,学一年。三年级开政治经济学。136 学时的学一年,90 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四年级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102 学时的学一年,68 学时的学半年或一年,由学校自定。

在有些系科,政治理论课也就是业务基础课,得不按此顺序。如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几年级开设,应由主管单位另订。

马列主义基础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顺序,学校可根据师资条件,作适当调整。

三、讲授与课堂讨论的学时比例

按四比一或五比一。即讲授四学时或五学时,可讨论一学时。学校可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安排。

四、考试与考查

凡半年学完的,学完考试;一年学完的,第一学期考查,第二学期考试。这一规定,一般都应按照执行;个别系科,如某一学期因考试科目太多,可由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试行方案》将此前归全体学生必修的政治理论课列为部分专业的业务课,从课程体系的设置层面努力减轻学生负担,“并使政治理论课能适当与专业相结合”,以期“提高教学质量”。《试行方案》是对 1949 年以来政治理论课设置、调整历程的总结,规定之完备、全面前所未有,这份

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政治理论课专业化的完成²²。

教育部虽然意识到“专”的重要性,在制度设计上致力于使政治理论课上“轨”道,将其纳入大学课程体系当中,但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在调查中还是发现有的教师不安心教学,认为“当政治教员没有前途,不如搞业务”。学生中不重视政治理论课的更多,据该委员会宣传部的调查,北京有些高校不重视政治课学习的学生约占10~12%,理工科学生“重业务、轻政治”思想尤其严重²³。高教部也发现,1953年下半年各高校开设“中国革命史”以来,学生学习情况不容乐观,北京钢铁学院不重视该课的学生有50%以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位学生按重要性排列课程次序,第一是表演,第二是体育活动,第三是声乐,第四是俄文,第五是文学名著(指小说),第六名才是政治理论课。学生不重视,是他们觉得政治理论课“在中学已学过,可以不学”,考试时“吹吹就及格了”,也即觉得政治理论课其实“专”得还不够²⁴。他们的做法也得到专业课教师的支持,有的高校系主任便认为“学生政治水平已经够高了”,从而挤掉政治理论课,抽出时间安排业务课²⁵。

随着1956年以来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松动,大学内部对政治理论课的质疑开始升级。武汉大学有学生怀疑政治理论课存在的价值,化学

-
-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的规定(试行方案)》,1956年9月9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27-28页。
 - 23 《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政治理论课基本情况的报告》,1954年3月,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62-163页。
 - 24 《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的初步经验及存在问题的通报》,1954年4月23日,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印《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辑,1955年,第138-139页。
 - 25 《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政治理论课基本情况的报告》,1954年3月,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163页。

系学生就觉得学习“政治经济学”毫无用处，“经济规律与化学有什么关系呢？”物理系四年级金属专业全班学生则干脆要求取消“历史唯物主义”课²⁶。北京大学中共党史教员因学生“看不起政治课教员，认为他们没有学问”，甚至主张停课进修两年，以后再开课。他们觉得以现在的水平教学，不仅无助于“提高马列主义威信，反而降低它的威信”²⁷。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费孝通认为，革命时期学习政治理论有其“必要”，建设时期主要是学习科学²⁸。

二，“用整风精神来学理论”

大学师生觉得政治理论课“专”的还不够，毛泽东已兼课程太多。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办法之一是“削减课程”²⁹。然而，直到5月15日，高教部仍主张大体维持1956年的《试行方案》，即开设4门政治理论课³⁰。倒是江苏省率先起来响应毛的号召。6月，中共发动反右运动。7月10日，毛泽东在南京召集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研究、部署反右派斗争³¹，7月中旬，江苏省委就决定自1957年下半年起大学政治理

26 《武汉大学学生的一些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7年第23期（总第203期），1957年3月23日，第3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41。

27 《北大教员提出政治课问题应作根本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7年第70期（总第250期），1957年6月7日，第3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42。

28 张腾霄《驳斥右派分子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污蔑》，《人民教育》1957年第9期，第8页。张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

29 毛泽东《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1957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征求对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意见》，1956年5月15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154，第5-6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 62 上 中共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论课“以批判右派论点为主”，在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运动³²，8月19日又指示各大学原4门政治理论课暂时停止讲授，专门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³³。

江苏省委还要求教师少读书，多参加实践活动。1957年7月29日，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刘顺元在省高等学校政治教师暑期训练班上猛烈批评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专”的倾向。刘说，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好看马列主义书籍，认为书看得愈多愈好，报告听得愈多愈好”。刘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不能成为书呆子，而是要接近群众，“到农村去睡稻草”；以后上课可以少讲内容，而是“出几个题目，学生回去调查研究。回来座谈讨论。开展辩论³⁴。”9月中旬，江苏省委文教部根据刘的要求，从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等校抽调青年教师30余人下乡三个月至半年。“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熟悉党对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农村中的阶级动态、生产状况”³⁵。

10月，中宣部也下定决心，“为了巩固反右派斗争的成果”，“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全国高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的课程³⁶。11月，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报告。12月10日，高教部据此下文，在

32 《使马列主义教学结合实际 江苏改进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工作》，《人民日报》（第4版），1957年8月27日。

33 《关于在本省高等学校学生中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356。

34 《刘书记在本省高等学校政治教师暑期短期训练班开学时的讲话》，1957年7月29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135，第29-39张。

35 《抽调高等学校政治理论教师到农村短期参加工作，从实际斗争中进行培养的意见》，1957年9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135，第1-2张。

36 《中央宣传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向中央的报告》，195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文献选编：1915-1992》第4册，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第63-64页；《许立群同志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课程问题的发言（记录稿）》，1957年12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313，第72张。

全国高校各年级普遍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课程学习时间暂定一学年，“各班级在学习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期间，原应开的四门政治课一律停开”。教学的方法，首先是指导学生精读文件，然后在此基础上组织“自由和充分讨论、辩论”。讨论和辩论时，应当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成绩的考核，一改过去主要考知识的办法，而于学期或学年終了时，结合学生平时的思想、行动表现进行学习总结³⁷。

这是中共建政后对政治理论课最大的调整。高教部放弃了1957年前又红又专的定位，而单纯强调课程的“红”，并在教学方法上搬用整风运动的一整套做法，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教授政治理论课。如此一来，政治理论课的“政治”二字大大加强，“理论”却被削弱了。

高教部虽然说“社会主义教育”课暂开一年，但直到1961年上半年，江苏省属十二所高校还“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至于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多数学校基本上没有开课”³⁸。以致有学生讽刺“政治课可以改为政治自修课了”³⁹。由于系统的理论学习完全停下来，学生的思想被改造到何等程度尚在未定之天，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的缺乏却是一望而知的。南京工学院1961年7月份的调查就发现，学生不知什么叫“劳动对象”，认为“资本主义也实行按劳分配”；也“不知帝国主义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好奇“美国没有皇帝为什么也叫帝国主义？”⁴⁰影响所及，甚至使教师也不提倡认真读书，惟恐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⁴¹。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指示》，1957年12月10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31-32页。

38 《江苏省属十二所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的情况》，1962年1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644，第1张。

39 《关于青年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况和问题》，1959年1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356，第15页。

40 《江苏省属十二所高校政治理论教育课的情况》，1962年1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644，第2张。

三，“两条腿走路”

1958年下半年，反右运动高潮退去，政治理论课调整中“专”的倾向又开始抬头。

9月19日，中共中央还要求评判政治理论课学习成绩时，“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应当以学生的实际行动来衡量学生的政治觉悟的程度”⁴²。三个月后，北京高校已有人大胆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课“跟运动走”，变化太多，不像一门课，教员“赶不上趟”，政治理论课今后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改造思想又要系统读书⁴³。在此前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在京高校举行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学生们也主张今后的政治理论课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学习时事政策，又要开设哲学、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基本理论课”⁴⁴。

1959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同意政治理论课考试除了要考察实际觉悟外，还要考察理论知识，虽然紧接着补充说“理论知识的考试应该改变过去让学生背笔记的教条主义办法，着重考察学生的实际理解程度并结合学生的平时表现进行评分，如果平时表现不好，不能给以最好的分数⁴⁵。”但是，比起1957年的大鸣大放来，毕竟朝“专”的方向摆过来一

41 《关于目前高等学校学生政治课教学的一些情况与问题的汇报》，1959年5月10日，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档案，A23-2-475，第107页。

4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38页。

43 《高等学校的政治课如何改进》，1958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8年第168期（总第503期），1958年12月25日，第2-5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50。

44 《许多大学生认为政治课既要改造思想又要认真读书》，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8年第170期（总第505期），1958年12月31日，第5-7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50。

点。4月,教育部举办“政治课教师学习会”,“学习方法以读书为主”,规定读的书,包括经典著作和政治理论课的教科书。开办两个月,参加者有800之众,“参加者一致认为读书好处很大,有人还提出希望延长时间⁴⁶。”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部党组也酝酿高校的调整,开始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7月24日,教育部下发《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各高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为:

1. 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2. 形势和任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开设的门数和学时,在不同年制的学校、不同的专业应该有所不同。文科各专业一般设四门: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学说)、政治经济学、哲学。理、工、农、医各专业和艺术、体育院校一般设两门:中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⁴⁷。

9月,《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进一步规定“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间,理、工科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左右;文科一般占总学时的百分之二十左右⁴⁸。”

45 《中共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关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几个问题向市委的请示》,1959年3月27日,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年~1976年》,第430页。

46 《两个读书会》,1959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9年第39期(总第544期),1959年6月2日,第3-4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建国后资料,C35.2-54。

47 《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1年7月24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41页。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5页。

根据7月24日的《意见》，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又开始强调“专”。相应地，课堂教学的侧重点也发生变化，该意见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着重帮助学生理解“经典著作和阅读教科书”。同时，考试也改为试卷评分为主，而且规定试题要力求做到“既能测验学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理解程度，又能测验学生运用理论分析说明实际问题的能力。”而学生的“政治觉悟、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另作鉴定⁴⁹。

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匡说得更加明确。1962年2月26日，王匡当着广州地区高校全体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面说，政治理论课的目的，“是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因此要把它“当作一门课程固定下，就象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课程一样”；既然是一门课程，就不应该将其地位拔得过高，“不能认为它比其它课程高出一等”，而是要按照课程建设的规律办事，要有“教材、有教师、有一定的教学程序”，总之“其它课程有的，政治理论课也要有”⁵⁰。同时，在教学方法上，王匡也反对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整风精神来学理论”，而是提倡教师“正确地、清楚地、通俗易懂地讲授教材中的基本知识”。

政治理论课既然强调“理论”的一面，“老教授讲课的那种烦琐考据方法”便又流行起来⁵¹。南京大学教授孙叔平“政治课是用材料证明理论，形势教育是用理论说明实际”的观点大行其道，“在部分高等学校中对政治教师的影响比较大”。受此影响，教师考虑的是“怎样使学生反映好，能博取威信和饭碗”，学生考虑的则是“怎样有个好分数，将来能分配个好的工作”⁵²。更有甚者，清华大学有两位学生毕业留校后教政治理

49 《改进高等学校共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意见》，1961年4月8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42页。

50 王匡《对广州高校全体政治课教师的讲话（记录稿）》，1962年2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214-1-41-115～119，第115-119页。

51 《许立群同志在高等、中等学校政治课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1964年5月27、28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档号3023-2-815，第39张。

论课，“她们的家长对外讲只是说在清华教书，而不敢说当政治课教师”，政治理论课教师普遍感觉“比业务课教师低一等，精神状态不振”⁵³。于是，突出“科学性”，“故作深奥”，成为政治理论课教师减轻专业课、学生品评两种无形压力的有效方法，有些教师甚至说毛泽东的著作无非是“时事政策”，“三论是哲学的重点，但缺乏完整性”⁵⁴。

有些教师无法靠学术水平在“科学性”上做文章，为了引起学生对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往往会讲一些“庸俗的甚至唯心的东西”，南京大学一位教师上哲学课时便又讲“八卦、算命”又讲“上帝”。为了强调意识的作用，有的教师举例说明：

有个孕妇想生个美丽的孩子，天天看美孩子的图画，结果生的孩子很漂亮；有个孕妇天天担心生的孩子会缺嘴，生下来果然如此⁵⁵。

“烦琐考据方法”式的教学流行了大约三年，政治理论课的钟摆又向“红”的方向甩了过去。1964年3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铺开，政治理论课首先受到冲击。在5月的“全国高等、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座谈会”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强调，“政治教育一定不能采取苏联那一套，记、抄、考、背笔记”，“政治课如果没有了政治，没有了阶级斗争，就是乱

52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全省高等学校政治理论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4年10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1-119，第10张。

53 《许立群同志在高等、中等学校政治课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1964年5月27、28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815，第39张。

54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关于全省高等学校政治理论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1964年10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1-119，第9张。

55 《高等学校1962-1963年度政治课概况》，原件无日期，据内容推断当不早于1964年，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629，第9-10张。

弹琴。政治课就是搞阶级斗争”⁵⁶。会后中宣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联合下发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开宗明义也说大学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

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坚强的革命接班人；是配合学校中各项思想政治工作，反对修正主义，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

该件虽然重提阶级斗争，但在课程设置上变化其实不大，大学政治理论课除继续保留“形势与任务”外，设置“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三门课程，只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一门。在教学方法上，高教部要求教师既“抓活思想”，又要认真读书，甚至还要“参加学术界的争论”，最好“结合教学进行学术理论研究”。显然，高教部试图“红”、“专”兼顾⁵⁷。12月，《人民日报》还火力十足地批判有些政治理论课教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敲门砖’”，似也可说明，这一现象确实存在⁵⁸。

结 语

1964年6月25日，中宣部理论处处长陈道在北京大学调研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时发了一通感慨：

56 《陆定一同志在高等、中等学校政治课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64年5月30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档案，江苏省档案馆藏，3023-2-815，第4张。

57 《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党组、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1964年10月11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6)》(修订本)，第50-51页。

58 本报评论员《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战斗作用》，《人民日报》(第2版)，1964年12月17日。

有人反映现在的政治课是靠压(批评不重视政治)、灌(注入式)、迫(检查笔记、质疑)、考(考试)来保鏢的。解放前不少学生冒杀头坐牢的危险看马列主义书,解放后我们把马列主义课开成这个样,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会把马列主义政治课变成国民党的党义课的⁵⁹。

陈道没有意识到,同样是传播马克思主义,1949年前后所处的大学生态已发生质的变化。1949年前,大学生冒险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是希望了解中共革命的缘起。实际上,不仅马列主义书籍吸引力巨大,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也大受欢迎⁶⁰。1949年中共建政后,革命对课程的支撑作用消失,课程的生存环境发生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从险学变成显学,相关课程也成为大学课程体系的一部分。不过政治理论课虽已植入,但要在大学原有生态中生长壮大,还是面临种种考验。

分科教学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点,政治理论课面临的考验很大部分来自分科体系下专业课程的无形压力。教育部(高等教育部)从课程名称的调整、课时的分配、各门课程间的次序等诸多方面,不断增加课程“专”的程度,却仍然难以消除大学生生态圈其他部分对课程的轻视。

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动无疑左右着政治理论课的整体面貌,但课程被植入大学后,也还是要适应大学运作的逻辑,即对学术的强调。可是一旦强调了“专”,难免偏离课程“红”的使命;突出了课程的“红”,又会降低“专”的程度。红与专之间的平衡,是政治理论课植入大学后长期面临的

59 《中央宣传部陈道等同志在北京大学找政治课教员座谈政治课教学问题的情况》,1964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001-022-01152,第1-2页。

60 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就发现,“一般大学生都[喜]欢听很新异的科目”,譬如在经济学系,“经济学概论可以没有,马克斯的资本论非有不行”,而“办学的人也每每迁就学生的意见”。见《朱家骅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讲演“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及应行注意各点”》,1931年8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81-282页。

挑戦。

「紅」と「専」のはざままで——政治理論科目の大学への導入

要旨：政治理論科目は、1949年10月の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に大学へ導入された。この時期、「紅（革命的ですぐれた共産主義思想を身に付けている）」であり「専（専門性の高い技術や知識を習得している）」である人材を育成するための基準が確立され、同科目は其中で「紅」を実現する上での主要な手段の一つとなった。当時の大学課程のシステムからすれば、政治理論科目は紛れもなく新生事物であった。それゆえ、各大学は相次いで政治理論科目を新設したものの、大学全体に見られる「學術の深淵を教授し、広く深く學問を修めた人材を育成する」という「専」の雰囲気は依然として教育課程において重大な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た。結果として教育行政部門と大学は、大学が元来有していたカリキュラムの体系を崩すことをできる限り防ぐために、教育課程の専門化の水準を次第に上げていくことを余儀なくされた。政治理論科目の教員には大学生の思想を改造するという重責が課せられてはいたが、状況が許す限り、彼らは一般的に進んで「學術の深淵を教授」しようとし、単なる「黨の宣伝員」に留まっていた。したがって、政治理論科目に関連する「紅」と「専」には実のところ二つの意味合いがあり、一つは政治理論科目と専門科目を対置する意味での「紅」と「専」であり、もう一つは政治理論科目それ自体に内在する「紅」と「専」であった。

政治理論科目は、1949年から1964年にかけて幾度も「紅」と「専」の間を揺れ動いた。その要因の一つとして、外部の組織である専門課程からの目に見えない圧力がある。同科目が必修化されたばかりの頃、教

社会、文化

育部はカリキュラム内容や授業時間の配分、各授業の開講順といった様々な方面に手を加えることで、政治理論科目の専門科目化を強力に押し進めた。1956年には、ついに政治理論科目の運営の仕組みが専門科目の基準に則って定められるに至った。しかし1年後には、反右派闘争の拡大に伴って、政治理論科目の運営は「専」を強調するものから「紅」を強調するものへと転換し、元々存在していた4つの授業科目は全て中止され、「社会主義教育」の科目がそれにとって代わった。授業内容や授業方法に関しても、知識重視の学習という元来の方向から、反右派の整風運動を手本とする方向へと、方針転換がなされた。このような状況が1年余り続いた後、1959年初頭に、政治理論科目の「専」の面を再び強調しようとする動きが中央と地方の両方で巻き起こった。これにより、教室での授業では古典的著作の講読と系統的な知識の学習に重きが置かれ、試験では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の基本理論について学生がどれだけ理解しているかを測ることが重視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だが1964年になると、社会主義教育運動の全面的な展開を受けて、政治理論科目が持つ専門性はまたしても標的となり、同年の10月末には、中央宣伝部が同科目を階級闘争の道具であると位置づけた。

以上のように、15年の間、外的な政治環境は絶え間なく変動し、それによって政治理論科目の位置づけも常に揺れ動くこととなった。「紅」と「専」のはざまでもどのようにバランスをとるのか。これが、政治理論科目が大学へ導入されて以来長きにわたって直面した課題であった。

Between “Red” and “Professional”: The Implant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49-1956)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andard of personnel training, “red and expert,” was established. A course on political theory was one of the main means to meet the set standard of “red.” Although the course was offered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aspect of “expert” in universities still significantly impacted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for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had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course’s professional level to avoid excluding the original ecology of the universities. Meanwhile, as long as conditions permitted, the teachers of political theory were generally willing to “teach profound knowledge” rather than merely acting as “propagandists of the party.” Therefore, in political theory, there were two meanings of “red” and “expert.” The first reflected setting apart “red” and “expert”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and specialized course, and the second implied “red” and “expert” within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itself.

From 1949 to 1964,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swayed between “red” and “expert.” After being listed as a compulsory cour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ushed for the specialization of the course in terms of content, distribution of class hours, and the order of each course. By 1956,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specialized courses, a set of operating mechanisms for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was established. However, only a year lat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its tone changed from emphasizing on the “expert” to emphasizing on the “red.” All the original four courses were stopped and replaced by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teaching method allowed free expression of everyone’s views. This

situation lasted for more than a year. At the beginning of 1959, both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began to emphasize on the “expert” perspective of the course again. Teaching focused on the study of systematic knowledge, and the examination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on testing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m-Leninism. In 1964,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ducation movement of socialism,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is course was questioned again. At the end of October,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ositioned it as a tool for class struggle.

Over 15 years,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visible pressure of the internal ecology of universities led to the vacillation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between “red” and “expert.” It was hard to balance between the “red” and “expert,” which was an inherent long-term challenge since the universities adopted this course.